学术专论

“盛极又衰”的圆明园
——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中心

孙成旭

［**摘要**］本文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主，探讨朝鲜士人圆明园印象的演变，同时分析圆明园由盛至衰的过程对朝鲜的影响。乾隆四十七年之前，朝鲜使臣未能亲眼目睹圆明园辉煌的一面，仅凭自己所持有的“小中华”意识以及儒家的观念，将圆明园视为“阿房”一样的皇帝娱游之地。而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他们参加圆明园的礼仪活动，亲眼目睹圆明园宴会的辉煌，感受到了当时的乾隆盛世，此前“游戏之所”的印象被打破，并从圆明园中看到了“太平文物之盛”。但到了咸丰十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毁坏，昔日朝鲜使臣眼中盛世象征的圆明园已呈现出衰象。

［**关键词**］圆明园　朝鲜　赴京使臣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5）－01－0061－09

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不久清摄政王多尔衮统清兵进京，顺治帝在皇极门颁布登基诏书，定鼎燕京。清朝迁都于“自古兴王之地”，继承了明朝的旧都，旨在“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①]，凸显其中华继承者的意图。清朝不仅继承了明朝地理上首都的地位，同时也将其天子象征的紫禁城作为自己的皇宫，并延续了明朝的礼仪制度。另一方面，在明朝的旧都上，清廷不断创建具有自我特色的象征，如以满汉分离政策区分内城和外城，将堂子建于玉河桥东侧，仿盛京清宁宫重修坤宁宫等。从康熙朝始，清朝内部局势稳定，在北京西郊地区开始大规模修建御园，北京从明朝的旧都逐渐转变为清朝的皇都。[②]在北京的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集中于紫禁城的权力逐步分散于外部空间，一方面，清朝皇帝常巡幸于盛京、热河等地，另一方面，在城外则建立了圆明园、畅春园等御园。[③]这些空间不仅是皇帝的游乐空间，还

［**收稿日期**］2014－09－15
［**作者简介**］孙成旭（1979—），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son79@126.com

① 《清世祖实录》卷 5，顺治元年六月丁卯。

②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302—353.

③ 参见阎崇年：《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 年第 2 期；及氏著《雍正帝与圆明园》，《中华遗产》2006 年 5 期；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105—115; Mark C. Elliott and Ning Chia, “The Qing Hunt at Mulan”,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edited by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75—77;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409—429；宋美玲：《康熙帝의清 帝國구상과滿洲族의 정체성》，《歷史學報》第 196 辑，第 133—136、152—153 页等。

是重要的政治空间，例如，一年中，康熙帝五六个月的时间都居住于畅春园，在此主管八旗的打猎及军事训练，处理各类奏折，接见各国使臣等，由此来看，畅春园也是有政治作用的场所。雍正帝也利用了此政治形式，只是将地点改为圆明园。此后，乾隆不断扩充圆明园，其也逐渐成为乾隆盛世的代表。

自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一直是清帝在北京的主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理政之所，还是与外藩使臣举礼仪宴会之地。清代圆明园政治与文化的含义及其带给外国的影响较大。但到目前为止，针对于圆明园对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圆明园与西方的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传教士参与过圆明园西洋楼的建设①，其次，传教士与西方使节的相关记录带给西方深刻的印象②，最后，圆明园的“失落”是西方列强侵略所为③。然而，圆明园的盛衰经历，对于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乾隆后期开始，朝鲜、安南、琉球等国使臣有机会参加圆明园的宴会，他们亲眼目睹了圆明园从盛至衰的过程。在当时，圆明园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庞大的建筑群，是标志着乾隆盛世的极点，文化及经济的冲击力相当大，而在被西方列强损毁后，依旧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冲击。其中，圆明园带给朝鲜的影响更为值得关注。④ 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原由战争建立，朝鲜依旧怀揣“思明”情感以及激烈的反清感情。⑤ 清初，朝鲜对于清朝来说是需要加紧控制的国家，而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则成为对清朝“勤修职贡，最为恭顺”的国家⑥，这两种不同的变化在朝鲜使臣圆明园游历记录中都可看出，同时记录中也体现了清朝由盛到衰的过程。

一、阿房？只闻未见的圆明园

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封胤禛为雍亲王，并赐园，慈恩锡以园额曰“圆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逝，雍亲王继位。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服丧期满，正式在圆明园朝政居住，圆明园逐渐成为皇帝的主园。而雍正年间，朝鲜方面有关圆明园的记载极少。朝鲜的官方文献《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同文汇考》以及朝鲜使臣的“燕行录”中只存在几处，其原因可能与雍正在位时间短，并且圆明园此时也不是召见外国朝贡使臣的场所有关。较早的记录出现于《承政院日记》雍正四年（英祖二年，1726）七月二十四日条。谢恩兼进贺正使西平君李橈（1684—?）、副使金有庆（1669—1748）、书状官赵命臣（1684—?），自北京归国后，向英祖复命时，英祖询问当时清朝的局势，

---

① 参见张复合：《圆明园“西洋楼”与中国近代建筑史》，《新建筑》1986 年第 2 期；杨玥：《从圆明园变迁看中西文化交流》，《理论界》2011 年第 8 期。

② 参见 F·阿蒂赫特著，李宏为译注：《一位法国传教士眼中的圆明园》，《历史档案》1999 年第 2 期；欧阳哲生：《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北京经验”——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为中心的讨论》，《中国文化》2011 年第 2 期；汪荣祖著，钟志恒译：《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11—128 页等。

③ 参见王开玺：《英军焚毁圆明园原因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英法被俘者圆明园受虐致死说考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郑艳：《英军焚毁圆明园原因考实》，《历史教学》2003 年第 2 期；耿昇：《孟斗班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新公布的档案文献揭露英军焚毁圆明园之真相》，《学术月刊》2006 年第 1 期等。

④ 关于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相关研究有祁庆富、金成南的《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清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一文。此文简述了朝鲜使臣参加圆明园宴会的情况、他们眼里的圆明园上元灯节，以及夏秋之交游览圆明园等的内容。但此文主要集中于盛世时期朝鲜使臣眼里的圆明园，未涉及圆明园兴起及衰落时期的情况。

⑤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63—84 页。

⑥ 王其榘编：《清实录·邻国朝鲜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 年，第 315 页。

李桡曰："即今雍正之兄弟中就囚者五人，而十四王今方幽置于陵所云。其中最可骇者，第二王之妻，施以治盗之刑云矣。"赵命臣对雍正帝的政治行为评价为"雍正之残伤骨肉甚"。从此可知，雍正帝在极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才继位，且朝鲜使臣对于其行为也持消极的看法。赵命臣又云："臣民之家称为富厚，则因事抵罪，必皆籍产，其数殆至数百家，以此人心疾怨，称之曰'爱银皇帝'，则其黩货无厌，极矣。皇后则弃置京城，只与宠姬辈出居圆明园，日事荒淫，左右宦妾，簸弄朝政，赂门大开，则宫禁之不严可知矣。"在他的眼里雍正帝是一个贪心并好色的皇帝，而圆明园是"日事荒淫"的空间。英祖听后，批判道："如此而虽欲不亡，得乎？彼虽胡人，其所处则天位也。天下之责，岂其少乎？即此以观，则其亡必不久矣。"① 朝鲜国王与三使对于雍正帝消极的认识，出于一直持续的反清情感及不断强化的"小中华"意识，故把雍正的政治行为与长居御园的事情相结合，圆明园就被想象成为贪心好色的空间。

雍正六年（1728），皇历赍咨官卞昌和（1692—？），自清朝礼部序班金超得到"圆明宫说话"。"圆明宫说话"包含着"查弼纳改过擢用事、官弁广善库'借俸'事、雍正帝动用官帑设立八旗'米局'事"，及"雍正帝欲改雍正七、八、九的三年为干支纪年的说法"等。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鲜朝廷议政会议中探讨了关于上述内容。其中，"雍正帝欲改雍正七、八、九的三年为干支纪年的说法"与在昌平府发现的一座碑有关，此碑有诗云："红花落尽放黄花，遍地胡儿乱似麻。东来西去归藏土，南上北下返牛家。七九之年虎哺兔，一人骑马踢双猢。八六家鸡夜宿粮，十个孩儿九哭娘。"雍正帝不解其意，但认为此乃不祥的征兆，故为避厄起见，"欲将明年七月起，不必写出年号，只写己酉、庚戌、辛亥"。而十三王认为"碑文解语，何足凭信。若据碑上之诗，不写年号，一若外扬，反为惶惑"，上奏"其现年历日文书稿案，仍照旧例。至于各衙门启奏事内有字眼不好者，请为改正。即如'年终尽数'四字，以臣愚见，改为'岁底全数'"。② 最终，雍正帝接纳了其意见。

此事虽然十分荒谬，但是朝鲜朝廷却对此事在内部进行了认真的议论。领议政李光佐（1674—1740）对其评论为："雍正所为，殊极可笑，年终之终字，尽数之尽字，恶其字义之不好，改以岁底全数。古语云：'讳亡者必亡，图存者必存。'文字意义，何至关国家之兴亡乎？……此等文字，必是好事者为之矣。"③ 雍正帝的做法必是灭亡的征兆，对于反清情绪极高的朝鲜也是一件好事。十二月初六日，英祖将此内容又给左议政洪致中（1667—1732）看，讽刺道："君臣上下，以此为事，何所益乎？"洪致中也持赞同之意："设使有前知之人，书后代之事，天地气数，非人力所致。况人君为国之道，惟以德为本，则变怪之事，自当消磨，何可取信乎？"④ 这次议论令朝鲜对雍正帝产生了更加消极负面的看法。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此议论来源于"圆明宫说话"。现无从得知"圆明宫"一词是故意的误记，还是实属误记，但"圆明"（圆融和普照）本身来源于佛语⑤，加"宫"字后产生了更加神秘的感觉，因为"宫"字常常用于道教宫观中。可是，在这神秘的背后，涉及到清皇室内部的故事，其来源于圆明园，这就说明除了紫禁城外还存在另一个皇室政治中心——"圆明园"。

乾隆早期，由于乾隆帝合法继承皇位，还定"行三年丧"，故朝鲜认为此举为"王者以孝治天下矣。闻新皇帝定行三年之制，群臣固争，而终不听云。乾隆初政，已可观矣"⑥，且对乾隆帝的评价普遍较好。同时，朝鲜一直抱有"胡运曾闻无百季"的期待，而"康熙千古英杰也，

---

① 《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甲寅。

② 《同文汇考》补编卷4《使臣别单四》。关于皇历赍咨官卞昌和的手本内容，详见罗冬阳：《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东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2期。

③ 《承政院日记》，英祖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酉。

④ 《承政院日记》，英祖四年十二月六日壬午。

⑤ 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页。

⑥ 《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丁酉。

雍正亦能守成，乾隆则席三世之业”①，百年胡运未终，由此朝鲜高度关注清朝局势。乾隆继位初期政绩突出，并未出现国运衰落的征兆。乾隆元年（英祖十二年，1736）出使清朝的冬至三使臣，在回国复命时，副使金始炯（1681—1750）报曰：“胡运已过百年，乾隆之政令如彼，而尚今支撑，实未可晓也。臣或接彼中所谓秀才，以书酬酢，而渠之所书，才满一行，则仍即投火，事之动静，莫可测也。今则乾隆广选天下文士，专为经学工夫云。”② 两年后，陈慰兼谢恩使回还，三使臣入侍时，英祖询问乾隆之治如何，副使徐宗玉（1688—1745）答曰：“彼中亦连凶，而彼人本不多食。故虽曰凶年，一家所储，犹为支一二年矣。且乾隆，真夷狄之贤君也。雍正则有奇刻之名，而此则行宽大之政，故谓之仁弱。以求言诏观之，以不论寡躬阙失、大臣是非，至有罪责台谏之事，乾隆可谓贤君矣。”最终，他将乾隆评价为“与康熙相埒”。③ 乾隆八年（英祖十九年，1743）九月，英祖上御熙政堂会见大臣时，曰：“乾隆之强盛，此康熙之力也。”左议政宋寅明（1689—1746）对曰：“康熙之力，何能及于三、四代之后乎？似是乾隆亦难者矣。”④ 由此可知，朝鲜内部对于乾隆的治世较为肯定，“康熙、雍正、乾隆，皆无失德，似不至于速亡矣”。⑤

但是，朝鲜对乾隆帝扩建圆明园一事却持否定看法。乾隆帝重视其父的御园，不断扩建圆明园，展现出其盛世之貌。可是，在朝鲜士人眼里，这样的举动是为了满足皇帝个人欲望以及剥削百姓之举。乾隆九年（英祖二十年，1744），进贺兼谢恩副使李日跻（1683—1757），关于圆明园向英祖报告，曰：“盖闻苑中仿十三省，设置楼台，每一楼，辄以各省之珍宝、花木、器皿，饮食盛之，又选其土之美女而藏之，以为游戏之所云。”不过，“此则既非今行时所闻知，故不敢登之于别单中矣”。⑥ 此后，英祖在赴京使臣复命时，常常询问乾隆朝圆明园等各种土木之役。乾隆二十三年（英祖三十四年，1758）三月，冬至使臣复命时，英祖问清朝之势如何，正使海兴君李橿（1700—1762）回曰：“其势则未详知其何如，而土木之役，则于古无比矣。”副使金尚翼（1699—1771）也曰：“圆明园四十里作行宫矣。”听后，英祖讽刺道：“厥民指其宫曰‘阿房’，指其车曰‘鲍车’，大抵比之于秦始皇矣。”⑦

英祖针对于圆明园的言语十分尖刻，这代表了当时朝鲜士人的普遍看法。虽然他们没有亲临圆明园，但他们认为皇帝离开皇宫，在郊区又造奢侈御园并常居，这是祸国殃民的举动。甚至，提倡学习清朝先进文物的北学派代表洪大容，也有同样看法。十八世纪中叶后，随着清朝与朝鲜关系的稳定，清廷对朝鲜使臣门禁政策的宽松，朝鲜使臣被允许游览圆明园周边地区。⑧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三十年（英祖四十一年，1765）以子弟军官身份来京的洪大容（1731—1783），于次年正月十一日才有机会前往圆明园周边地区游览。一般皇帝居住圆明园时，游览附近地区较为困难，而此次正值乾隆幸于东陵与泰陵，清朝朝鲜通事徐宗孟方告之可前往游览。他从西直门出城，游至西郊一带可以远眺畅春园与圆明园。他见到畅春园时，评价康熙帝，“圆明园在畅春园西十里，雍正之离宫，今皇之时御。康熙帝御天下六十年，简约以没身，即畅春园可见矣。”而

---

① 《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甲戌。
② 《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三年四月初九日丁卯。
③ 《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壬戌。
④ 《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九年九月初十日己丑。
⑤ 《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九年八月十七日丁卯。
⑥ 《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丁巳。
⑦ 《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庚戌。
⑧ 笔者查阅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等后知，目前为止，笔者所见最早的记录出现在乾隆二十五年（英祖三十六年，1760）以书状官的子弟军官身份出使清朝的李义凤《北辕录》。

从圆明园来评价乾隆帝，“嗣君不能遵守矩度，创立别园，已失先皇本意。制作之侈大，又不啻十倍。而今皇益加增饰，佳丽反胜于都宫。康熙帝崇俭居野之义安在哉!”① 洪大容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影响到正祖。乾隆四十年（英祖五十一年，1775）三月二十九日，他以世子翊卫司侍直的身份为世子李算（后为正祖）讲学，李算问曰：“圆明园比畅春园何如?”洪回曰：“宏侈奢华不啻百倍，若西山则又十倍于圆明。即此宫室之奢俭，其君之贤否，世运之升降可卜，且西山楼阁台榭，沿河四十里，属于京城之西，其位置结构，穷其巧妙而实同儿戏。竭生民之膏血，惟供无益之玩戏，敛怨于当时，贻笑于后世，可为千古之鉴戒。而沿河楼阁，近颇剥落，想亦意阑，不复游衍也。”②

这个时候，朝鲜士人对于圆明园的看法普遍较为消极。他们眼中乾隆扩建圆明园的做法以及经常宴会于此就是“为游观之娱”。他们的评价不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后得出的，而是按照儒家观念的标准所作的判断。虽然圆明园奢侈的扩建是乾隆皇帝盛世的标志，但是却没有给朝鲜士人带来如此的印象。

二、观“太平天下”灯，听“歌竞万年称”

十八世纪末，朝鲜使臣亲自入圆明园，参加上元宴会，才最终打破了朝鲜使臣一直以来的消极看法。在乾隆盛世时，国内繁荣昌盛，宫廷内的筵宴制度较为完善，这一时期也是清朝宴请活动的全盛时代。③ 除紫禁城经常举办宴会外，皇帝还经常在居住的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其他行宫中，举办不同名目、不同排场的宴会。朝鲜使臣第一次参加这类宴会，是在乾隆四十七年（正祖八年，1782），刚过乾隆七旬之年。④ 正月初九日，冬至正使黄仁点（1732—1802）和副使洪秀辅（1723—1800）入紫光阁参加岁初宴，十三日到十五日在圆明园参加皇帝举办的上元节宴会。⑤ 这次宴会不仅有朝鲜使臣参加，琉球、南掌、暹罗的使臣也一同前往。如果说乾隆四十七年前所举办的宴会还只是为了与藩部加强关系，那么此次宴会就是逐步扩展和加强与境外藩国关系的开始。其变化的主要背景为，十八世纪后期，清朝进入盛世的巅峰，乾隆帝标榜其“共主”（universal ruler）的自信。⑥ 乾隆帝的这一政治意图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成功，朝鲜国王对这次参宴的谢恩表文中称：“禁苑深严之地，离宫清燕之辰，随中朝班联之后，观太平文物之盛”，且称赞颂扬，“开琼筵于元宵，许厕贵近之迩列，缀火树于御苑，俾瞻太平之胜观，至若珍赉之偏加，别是偏邦之殊眷，伏遇久道成化，率土归仁方万里，悉主悉臣，东渐西被，余四纪已安已洽，近悦远怀，遂令僻陋之封，亦蒙稀旷之渥。敢不俯詑民庶，仰戴皇灵”。⑦ 虽然此赞扬是出于朝贡关系中的事大礼仪的表现，但是在“近悦远怀，遂令僻陋之封，亦蒙稀旷之渥”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乾隆帝的意图已经传入朝鲜。

可是，参加圆明园宴会的朝鲜使臣的看法却与此不同。这次参宴的副使洪秀辅写了《出塞

---

①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9《燕记·圆明园》，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9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20页。

② 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2《桂坊日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第54页。

③ 中华世纪艺术馆、故宫博物院编：《清宫宴乐藏珍》，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0—16页。

④ 圣制《紫光阁小宴外藩即席得句［壬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上册，第346页。

⑤ 《正祖实录》卷13，正祖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辛卯。

⑥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2—3.

⑦ 《同文汇考》原编卷32《节使十五》。

录》，虽然此书现已失传，但是李献庆（1719—1791）给此书所作的跋文曰："一日胡皇盛设杂戏于圆明苑，以夸耀诸国使。此乃孔夫子所诛于夹谷者，君固已不乐于与宴。"① 又蔡济恭（1720—1799）在此书的序文中说："君以冬至副价赴北朝，清皇坐圆明苑，设杂戏旬日，引诸国使与宴。顾君曰：'速制诗以进。'君辞不获，则强以应，清皇大惊叹，赏赐锦缎文房具过当。"② 从这两段中可以看出，洪秀辅既不愿参加清帝主持的圆明园宴会，也不愿向清帝献诗，而此类礼仪活动让其有"夹谷会齐"之感，就更不要说感受到乾隆的"以示怀柔"之意了。

对于依旧怀揣"小中华"意识的朝鲜士人来说，洪秀辅持此想法十分普遍。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华丽的宴会也十分感叹。乾隆四十八年（正祖七年，1783）参加圆明园上元宴会的冬至正使郑存谦（1722—1794），在《燕行日记》中，将其宴会中参观过的灯戏和杂技，十分详细地记录下来。他观看灯戏表演时，如此感叹："结花平花即熄，自御座前忽有飞火，缘索而走，着于红门杆头。杆上皆有横索，周匝于旗、树木之间，火点跳掷，东奔西走，迅如流星。顷刻之间，西面火起，地中埋炮，纵横上下，轰轰掀动天地，光焰辉烁，晃如白昼，诚一壮观。"③ 一起参加的副使洪良浩（1724—1802）也感叹道："画障罗仙侣，铜帘化老僧。文成太平字，歌竞万年称。笔下描难尽，人间见未曾。岂徒观盛丽，知是导丰登。"④

在圆明园举办的上元节宴会中，山高水长阁举行的灯戏，特别引得朝鲜使臣的注目。山高水长阁建于雍正四年前，建成时名为引见楼，乾隆三年更名为山高水长阁。每到上元节，山高水长阁都异常热闹，皇帝在此设武帐宴招待外藩使臣，还在上元节举办灯戏。山高水长阁的宴会奢侈华丽，特别是在此宴中"烟火大发，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⑤ 乾隆五十六年（正祖十五年，1791），随冬至兼谢恩使来京的金正中，次年正月十三日参观在山高水长阁举行的灯戏，云："庭东西植紫纸炮，炮响轰戛，火炮如流瀑注下，或腾跃空中者，或走地二三丈者有之，光景愈出愈奇。元宵之戏，以灯为甲者，实非虚语也。问诸灯戏之法，土人曰：'灯号万盏灯也。'用细丝因机牙互相牵动，使之明灭于一时。始知中土之智巧，非偏人所可及也。"⑥ 对于圆明园与其宴会的如此描写，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燕行录"中较为常见，并且朝鲜使臣在复命国王时，也基本看不到对圆明园消极的报告。实际上，朝鲜使臣在亲眼目睹圆明园宴会的辉煌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清朝的盛世。

三、天下奇观中的"衰之象"

宏丽的圆明园以及奢侈的宴会，不禁让朝鲜使臣大为感叹，在此后的使臣的复命报告与燕行录中几乎不存在消极的观感。朝鲜使臣向国王报告中主要简单记载他们参加圆明园宴会等礼仪活动，并且在"燕行录"中也很少出现个人主观判断，多为详细描写圆明园的景观以及宴会的情景。圆明园及西山一带也成为朝鲜使臣使行时必游的天下奇观。甚至带有极大反清情感的吴载绍（1739—1811），⑦ 在嘉庆八年（纯祖元年，1801）出使来京时，亦"欲转寻西山，以极天下之

---

① 李献庆：《艮翁先生文集》卷21《含翠洪侍郎君择（秀辅）出塞录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4册，第441页。

② 蔡济恭：《樊岩先生集》卷32《洪侍郎君择（秀辅）出塞录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第67页。

③ 郑存谦：《燕行日记》，引自李昌淑（이창숙）：《燕行錄에 실린 중국 演戲와 그에 대한 조선인의 인식》，《韓國實學研究》20，2010年，第150页。

④ 洪良浩：《耳溪集》卷6《元宵灯戏二十韵》，《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第100页。

⑤ 赵翼：《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1—12页。

⑥ 金正中：《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75册，第180—190页。

⑦ 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

观，既闻其人工造出”①。

然而，从嘉庆十七年（纯祖十二年，1812）开始，朝鲜使臣的报告中再次出现对于圆明园消极的看法。是年四月八日，冬至书状官韩用仪（1772—?）复命时，曰：“闻市肆之间，珠贝、金玉，比前甚贱”，因“皇帝不近华侈之物”，而“皇帝之雅好节俭，不喜游宴”，但“以圆明园灯戏一事言之，数旬留连，杂设声技，徒费财货，殊甚无谓”。最后他认为“自古流来之规，今难猝改，黾勉遵行，而初非本意，故每年此宴，不过霎时旋罢”。② 出现这种报告的主因是乾隆盛世时期许多社会弊端被掩盖，而到了嘉庆朝，这些问题统统显露出来。朝鲜使臣在搜集清朝情报时，经常接收到白莲教之乱、社会奢侈之风、官僚的腐败以及国家财政危机等信息，而在嘉庆继位五、六年后，朝鲜使臣这类的报告不断增加。例如，嘉庆十三年（纯祖八年，1808）出使清朝的冬至书状官金启河（1759—1834）在“闻见别单”中写到：“乾隆以来府库荡然，皇帝稍存节省，然台湾之征讨，人疲供亿，河津之疏筑，岁费钜万，又以五旬庆节，赏赐、宴游，殆无虚日，加之辇输木石，屡起土功，如此而四海民力安得不困乎。”③ 由此，圆明园宴会不再带给朝鲜使臣此前的积极作用。道光五年（纯祖二十五年，1825），冬至书状官李镇华（1771—?）向国王呈交的“闻见别单”中亦云：“皇帝幸圆明园，两国使臣随诣，连日设灯戏，又设戏令两国使臣入参，诸般杂戏，比乾隆嘉庆之世，三分减二，盖其花费为累钜万之故，皇帝为省费节用，而外议则以吝惜财货，废坏旧典，不无谤言，一皇帝御极以后，民穷财竭，公私荡然，御库亦空，至于市铺之间，宝贝绝稀，卖买之际，银货罕用，凡百萧条，非复昔日之繁华，讹言日炽，人心益淆。”④

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各种“燕行录”中的内容，却与官方报告中的内容不同，较少有消极的情感。其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圆明园呈现衰退之势，但是此衰落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过程，一般从“塘报”或从清人口中有所闻才可了解。然而，对于一生只能出使一两次中国的朝鲜使臣而言，圆明园还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取消上元节宴会灯戏，“燕行录”中关于圆明园衰落的记载才开始出现。圆明园灯戏曾经是最惹朝鲜使臣关注的宴会，奢华的布置和华丽的表演，都是朝鲜士人十分向往的“天下奇观”。原来正月十五日，“设宴于正大光明殿，令诸国使臣来参亦例”，但道光二十二年（宪宗八年，1842），“是日例设山高水长阁灯戏，而此来连值叹荒，未得为之。今年亦停之，而只设正大光明殿宴”。并且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影响到北京元宵节的气氛。“中国之俗，以元宵为灯戏，盖昔然矣。曾闻满城悬灯辉煌璀璨为一瑰观矣。今来所见不如所闻，或有琉璃羊角灯悬于檐角者，且或有结棚而悬之者，而稀少无足可玩，抑因比岁叹荒，渐次降杀。”⑤ 道光二十八年（宪宗十四年，1848），以书状官伴当身份来华的李遇骏（1801—1867）又云：“自唐时，上元灯戏名于天下，有曰‘鳌山灯戏’、‘西洋秋千戏’，其状不一，有如象鼻之喷墙，有莲花之满盆，许多幼奇，不可殚记，其费多至银百万。”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此乃太平流来之盛事，近年皇帝命罢之，不害为美政”，而可知“亦衰之象欤”。⑥

圆明园上元灯戏到咸丰十年（哲宗十一年，1860）才得以恢复。虽然清朝正值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是这一年，咸丰帝正值三十岁并登基十周年，故在上元节宴会中举办了较为隆重的灯戏表演。不过本次宴会的安排并不顺利。道咸年间，一般正月十五日前后，在圆明

---

① 吴载绍：《燕行日记》，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 1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文学研究所，2001 年，第 392 页。不过，他对于皇帝长期居住御园的做法极为反对，故最终没有游历。

② 《日省录》，纯祖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庚戌。

③ 《日省录》，纯祖九年三月十三日癸酉。

④ 《日省录》，纯祖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

⑤ 金贞益：《北征日记》卷 2。

⑥ 李遇骏：《梦游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 77 册，第 62—63 页。

园“赐近支宗藩等宴”、“赐朝正外藩筵宴”等。可当年正巧发生月食，故改变了上元节宴会排程。① 直至正月二十日咸丰帝方于奉三无私殿升座，赐近支宗藩宴，并在山高水长升座，赐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及外藩使臣等茶果，观灯戏。②

朝鲜使臣也参加了这次山高水长阁的宴会。原本宴会规定只可正副使参加，书状官则不允许参宴，但由于书状官金直渊（1811—1884）与礼部通官熟识，便让通官把名字加在名单中得以混入。③ 虽然金直渊不可与正副使一同上殿，但可观览附近的角力、幻术、灯戏等表演，他感叹表演的新奇和奢华，同时也对表演持有疑问和否定的看法。他对灯戏表演的描述：

> 以为此灯戏也，道光以后，财绌未遑；今日之举，实盛举云。嗟乎，余固聋于乐者，其何以观盛衰之运，审得失之政乎。虽然，古人有言曰：“圣王制乐，赞扬治道，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气。”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易俗，致和乐之极。四海朝观，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观威仪之序。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吾未知今日之举，非所谓礼外之观耶。……幻人吐火跳丸，自支解，易牛马头。本西海夷掸国之技，而汉末始入天子之庭。若蔓延鱼龙角抵，则巴俞都卢之戏，而汉武帝既服远夷，设其戏而观之，改名平乐观，所以夸大之也。今遇难未已，外御是急，顾乃强作，此无益之举，而谓之盛学可乎。④

虽然表演带给了朝鲜使臣全新感和好奇感，但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当政者的奢侈无度。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清朝皇帝举办如此奢侈的宴会，在朝鲜使臣眼中只能体会到祸国殃民的感受。

金直渊回国不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此后，英法联军以烧毁紫禁城相要挟，于九月十一、十二日，迫使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此消息于十二月底传入朝鲜。九月十一日，朝鲜皇历赍咨官金景遂（1818—?）入清朝境内，十月初一日抵达北京，途中得知咸丰帝避难热河以及清朝与英法商定条约之事。他于十二月初回国后，将其见闻的手本交于备边司，朝鲜国王哲宗于十二月初九日得知其内容。此手本中详细描述了《北京条约》签订前后的经过，以及英法联军在北京疯狂实施的掠夺行为，其中云：“（八月）二十三日，诸匪至圆明园、万寿山、西山等，宫殿私室都为烧烬，掠夺御库及民财，亦不知几千万两，而以车驮去，至为八百余辆之多”，并且由于战争的影响，“耕织土产一无到京，则旧已罄、新未及，廛市自然空虚，闾里猝难繁华矣”。⑤ 其消息一经传播，朝鲜社会民心波动，甚至有些官员也萌生了辞官回乡的想法，⑥ 可以看出，清朝政局的动乱给予朝鲜内部深刻的影响。

此后，朝鲜使臣便不能再体验圆明园及园内举办的宴会。但是圆明园并未在他们的游览经历中消失，他们仍然游览西山一带亲自观看十八世纪末以来出名的名胜古迹，但其华丽的面貌早已消逝，只留下斑驳的外表。同治八年（高宗六年，1869），随冬至兼谢恩使来京的成仁浩悲叹道：“白玉高桥十里河，葱葱佳气百年多。迷花野色和烟雾，窈窕山光被绮罗。丹雘犹惊余殿阁（洋人樊共殿阁，余存无几，故云），繁华缅忆古笙歌。无端一炬灰强半，盛极又衰天道何。”⑦ 十九世纪后期，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下，昔日朝鲜使臣眼中盛世的象征圆明园已成为衰落的表象。但这一表象却在朝鲜士人心中制造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立。在“洋夷”的威胁下，清朝

---

① 金直渊：《燕槎日录》卷中，《燕行录全集 · 日本所藏编》第 3 册，第 73 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 · 咸丰朝》咸丰十年正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年，第 49 册，第 29564—29579 页。

③ 金直渊：《燕槎日录》卷中，《燕行录全集 · 日本所藏编》第 3 册，第 79 页。

④ 金直渊：《燕槎日录》卷中，《燕行录全集 · 日本所藏编》第 3 册，第 80 页。

⑤ 《日省录》，哲宗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戊辰。

⑥ 李光麟：《韓國史講座（V）近代篇》，首尔：一潮阁，第 10 页。

⑦ 成仁浩：《游燕录》，《燕行录全集》第 78 册，第 81 页。

已不再是“夷狄”，而是连手对抗“洋夷”的对象。咸丰十年“失落”的圆明园更给此后的朝鲜使臣加强了这一意识。

主要参考文献

[1]《朝鲜王朝实录》，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年。

[2]《承政院日记》(英祖朝)，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 年。

[4]《日省录》(纯祖朝、哲宗朝)，首尔：首尔大学校图书馆，1992—1996 年。

[5] 阿蒂赫特著，李宏为译注：《一位法国传教士眼中的圆明园》，《历史档案》1999 年第 2 期。

[6] 蔡济恭：《樊岩先生集》，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36 册，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9 年。

[7] 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8] 洪大容：《桂坊日记》，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48 册，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 年。

[9] 洪良浩：《耳溪集》，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48 册，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 年。

[10] 金贞益：《北征日记》，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尊经阁藏本。

[11] 金正中：《燕行录》，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75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

[12] 金直渊：《燕槎日录》卷中，载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 3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文学研究所，2001 年。

[13] 李昌淑（이창숙）：《燕行錄에 실린 중국演戲와 그에 대한 조선인의 인식》，《韓國實學研究》20，2010 年。

[14] 李献庆：《艮翁先生文集》，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34 册，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9 年。

[15] 李遇骏：《梦游燕行录》，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76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

[16] 欧阳哲生：《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北京经验”——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为中心的讨论》，《中国文化》2011 年第 2 期。

[17] 祁庆富、金成南：《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清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18]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

[19] 汪荣祖著，钟志恒译：《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

[20] 吴载绍：《燕行日记》，载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第 1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文学研究所，2001 年。

[21] 赵翼：《簷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22] 中华世纪艺术馆、故宫博物院编：《清宫宴乐藏珍》，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

[23]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4]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The Vicissitudes of Yuanming Yuan: Focus on Choson Envoys Mission to Beijing

SON Sungwook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son79@126.com)

This paper examines Choson envoys' experiences of the Yuanming Yuan to explain their views of Qing dynasty. Choson envoys had not previously experienced the type of ritual activity they found in the Yuanming Yuan. Relying on Confucian ideas and their own cultural self-identity as “Little China” they assumed the Yuanming Yuan was as an entertainment garden for Qing emperors such as Epang Palace. But, as Choson envoys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ritual activities at the Yuanming Yuan after 1782, they saw the prosperity of the Qing Dynasty manifested in the Yuanming Yuan. Their views of the palace also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However, in October 1860, British and French troops destroyed the Yuanming Yuan. Thus, the image of the Yuanming Yuan changed from the prosperity of Qing Dynasty to the symbol of its decline in the eyes of Choson envoys.